

· 人文城市研究跨学科学术共同体 · 文明互鉴与城市中国（四） ·

发现空间的“某处”

——重探都市批判理论的空间生产-重构问题

高宇

【内容摘要】 以列斐伏尔、哈维等人为代表的都市批判理论，揭示了资本主义空间生产与重构过程中的“某处”。都市作为资本积累得以展开的具体空间节点，同时具有潜在性与必要性、抽象性与具体性、矛盾性与宿命性，因而构成一个根本性的矛盾场域。通过持续的都市化、空间商品化与抽象空间生产，资本主义试图在此建立统治秩序，实现某种“积累乌托邦”。然而，这一积累空间一旦被具体化，便必然转化为充满差异的、以使用价值为导向的矛盾空间，进而导致资本统治的松动与危机。资本主义不断通过对空间的征服与重组来延缓危机，却又因空间的辩证矛盾而陷入新的困境。基于此，当代城市更新应从单纯的资本积累逻辑转向更包容、更注重差异化的空间重构实践，在对“空间强迫症”的超越尝试中，探索社会空间未来的更多可能性。

【关键词】 都市批判理论 都市革命 空间的生产 空间强迫症

【作者】 高宇，南开大学文学院助理研究员。（天津 300071）

【基金项目】 天津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年度项目“都市批判理论中的‘空间重构’问题研究”（TJZWQN22-002）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城市地理及其空间因素，在社会发展变化中的作用愈发受到重视。一批代表性理论家（如亨利·列斐伏尔和大卫·哈维等）及其著述直接引发了“空间转向”这一重大人文思潮。21世纪初，哈佛大学尼尔·博任纳（Neil Brenner）教授和哥伦比亚大学彼得·马尔库塞（Peter Marcuse）教授等城市研究者，捕捉到全球都市问题与经典批判理论的结合点，将空间转向以来的人文地理学思想成果概括为“都市批判理论”（critical urban theory）。

该理论流派主张，资本主义城市并非只是资本积累战略的实践场所，更是在特定历史地理条



① Peter Marcuse, Margit Mayer and Neil Brenner, "Cities for People, Not for Profit: An Introduction," in *Cities for People, Not for Profit: Critical Urban Theory and the Right to the City*,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12, p.2.

件下,承载并激化资本主义内在冲突与矛盾的竞技场。资本主义城市总是以资本主义系统的运作,即都市化和商品化进程的实现为目标。其空间必然在根本上是变动不居的——资本主义必须持续借由对抗性社会力量的冲突,即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冲突,来进行社会空间配置维度的运动。^①一方面,该运动必须发生于现代空间的“某处”,总是导致对地理空间的不断回归和持续的空间重构。另一方面,该运动内含的冲突,意味着资本主义自身进程的不稳定特征甚至潜在的失败宿命。

所谓“某处”,指的正是资本主义社会空间实践得以开展的特殊“所在”。它并非惯常意义上固定和静止的纯粹场所概念,而是显著地具有“多异性”的空间政治经济学意涵。首先,这一所在,既是必要的,也是潜在的:包括都市化在内的空间生产与重塑,总是要遵循资本积累这一根本动机,依托其底层逻辑和要求,通过总体的规划设计及其工具理性来实现,开展和实施的过程并不处于社会运作与日常生活的显性领域。其次,这一所在,同时是抽象的和具体的。尽管资本主义社会空间生产的目的在于为资本积累提供价值生产、交换和流动的“抽象空间”,但它不得不围绕具体的场所构建起必要的物质性基础设施,因而总是居于流动和固定的双重状态之间。最后,这一所在既是矛盾性的,也是宿命性的:生产性、支配性的抽象空间一经实现,便成为消费性和取用性的差异化空间;资本积累和社会统治的必须要素一经固定,这个空间就立即走向了自身的反面,因而始终深陷于建设-破坏的循环之中。

不妨将“某处”看作内在和固存于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空间的“实在界硬核”,一种内部的否定性存在。而城市化、城市更新等持续的空间实践,可看作资本主义借助规划理性和精妙计算,在这一“剩余物”之上建立主导秩序的反复尝试。然而,围绕这一特殊所在开展的空间生产-重塑实践,非但不能导向资本主义问题的彻底解决和超越,还往往使其陷入某种“强迫性重复”的两难境地。这在空间政治经济学之外,为都市批判理论考察资本主义发展与城市地理景观变迁,进一步提供了某种“病理学”式的视角。

“某处”的发现:作为事件的“都市革命”及其“盲域”

谈及列斐伏尔,一个常见的评价是,他开启了从空间角度政治性地理解社会世界的大门。但直到《空间与政治》(1973)出版之前,他关注的核心对象仍然是“都市”而非“空间”。在《空间的生产》(1974)中首次梳理从“神圣空间”“历史性空间”向“抽象空间”的转变,进而提出“空间的三元辩证法”之前,列斐伏尔已在《都市革命》(1970)中完成了乡土社会、工业城市向“都市社会”的阶段划分,并提出了“都市总问题式”(Problématique urbaine)的论题。20世纪六七十年代席卷欧美的社会文化危机,在当时也被广泛看作普遍而深刻的都市社会危机。这应当是一个重要原因。

起初,列斐伏尔提出“都市革命”(La Révolution urbaine)这一概念,预言并论证了资本主义社会组织方式的重大转变,即由工业化主导转向都市化主导,并重新勾勒出从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再到都市社会的总体历史进程。在他看来,要理解“前进”着的城市发展进程,必须首先假定一个潜在现实(即都市社会),并由此“回溯”眼前的现实及其历史。^②但值得注意的是,列斐伏尔在《都市革命》开篇特别强调,这绝非什么“有机、连续和进化”的过程,而是显著“非连续的”。用他的话来说,都市社会的孕育,发生在“那些继承了非连续的转变的、旧的都市形式发生

② 亨利·列斐伏尔:《都市革命》,刘怀玉等译,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27、64页。

爆裂之后”的事情。^①全新社会形态的形成，必定建立在旧的社会发生危机，新的因素和关系开始出现的基础之上。

例如，列斐伏尔指出，在早期政治城市向商业城市转变之际，城市第一次因其“异位空间”而在社会整体中获得了特殊的重要性，从而组成了“城市-乡村”这一全新的二元结构。他直接称之为“一件鲜为人知却影响深远的‘大事件’”。^②再比如，列斐伏尔指出工业城市绝非商业城市的自然发展结果，而是首先在“非城市”和“反城市”之地（能源、原材料和劳动力资源附近）扎根，进而以“内爆-外爆”和都市组织的方式吸收所有前工业城市的剩余物，入侵现有城市乃至建立全新城市。他视其为某种“爆裂”带来的“集中化”。^③更重要的是，列斐伏尔在工业城市和都市之间发现了一个“关键时期”（phase critique），其间所发生的事情则隐匿于某种“关键领域”（zone critique）之内，就像“黑匣子（暗箱）”一样。他将这一切统称为一个“盲域”（champs aveugles）。^④根据列斐伏尔的说法，使用“盲域”这一概念是因为在从乡土到城市、从城市到都市的历史进程中，实际发生变革的社会领域对我们而言是“看不见并且不知道自己看不见的”。^⑤

在《都市革命》中，列斐伏尔以大量耐人寻味的表述来凸显都市化进程的非连续性。这很难不让人将城市空间及其历史转向（也就是都市革命）理解为一系列的“事件”。实际上，以事件的视角看待都市革命，用历史性的眼光审视城市空间转向进程中的关键节点，本就很像斯拉沃热·齐泽克在其“事件哲学”中所使用的思路。

一方面，根据齐泽克的说法，事件具有某种显著的回溯性结构——“事件性的结果以回溯的方式决定了自身的原因或理由”。^⑥列斐伏尔的城市空间研究恰好遵循了以回溯理解前进、经由城市空间的当下理解其过去的事件性路径。另一方面，齐泽克进一步将事件界定为某种“超越了原因的结果”——“原因与结果之间的界限，便是事件所在的空间”。^⑦按照齐泽克的说法，事件的发生并不遵循因果链条，因而总是呈现为某种凭空出现之物。这不仅有趣地对应着列斐伏尔非连续和非自然的城市发展观，事件空间晦暗不明的特征，更将问题焦点引向都市社会发展的关键时期及其盲域。

齐泽克总结认为，“事件总是某种以出人意料的方式发生的新东西，它的出现会破坏任何既有的稳定架构”。^⑧这同样可以用来审视都市革命所导致的结果。以自然观念的变革为例，列斐伏尔指出，随着18世纪末19世纪初自然拜物教的出现，城市在“由土、空气、水和火构成的原始自然”基础上建立了“表现为石头和金属的第二自然”；“真正的”自然日益衰微，但自然的符号和模仿（公园、绿地等）却以能指和表象的方式为都市生活提供全部的意义与内容，成为去问题化的中立对象。^⑨类似地，都市空间和都市景观之所以被大多数人视而不见，正是由于我们的眼睛和使用的概念，早已被早期的乡村风景和工业组织所形塑，这些已有之物往往将正在发生的现实“简化还原”，导致我们“再也看不见一个新的空间”。^⑩总而言之，就某种“我们藉以看待并介入世界的架构的变化”^⑪而言，都市革命的确可以称得上是一起真正的、齐泽克意义上的事件。

不仅如此，齐泽克还将事件区分为想象的事件、象征的事件和实在的事件。所谓象征性事件，就是能指堕入所指，成为其所指涉的对象的那个时刻。^⑫在《都市革命》中，列斐伏尔正是将都市作为一个“主能指”提出——这个能指（都市总问题式）如同一面旗帜将社会世界中的种种领域、事实和差异（工业、农业和都市）都归拢于其下，从而“建立了属于自身的社会现实”（都市社会）。

①②③④⑤⑨⑩

亨利·列斐伏尔：
《都市革命》，第
4页，第13页，第
16页，第17、30页，
第32页，第29—
31页，第33页。

⑥⑦⑧⑪⑫ 斯拉
沃热·齐泽克：《事
件》，王师译，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16年，第3页，
第4页，第6页，
第13页，第159—
160页。

换言之，当都市这个主能指被施加于其对象之上，这一概念相对于该对象的“冗余”便给后者增加了某种不可知的特性。这也解释了为何列斐伏尔要使用盲域这个意象，来形容尚未被观察和注意到的都市现实。

需要强调的是，列斐伏尔对城市与都市现象的分析，显著地使用了语言学等方法。但这并不意味着都市被等同于某种语言或符号体系。列斐伏尔眼中的都市毫无疑问是真实社会语境中的真实社会现象，他只是希望通过语言学的方式视都市为“一个整体、一种秩序”。^①考虑到语言同样属于典型的象征界，这恰好说明了都市革命为何可以被作为一起象征性事件：政治城市向商业城市的转变，工业城市向都市社会的跃迁，这些城市发展中的“过去”已然构建起了都市社会全新的象征秩序。然而，这些象征秩序的创生过程无法预先被观察和设想，只能在认识发生之后，才仿佛突如其来地“全然在此”。

① 亨利·列斐伏尔：《都市革命》，第58页。

图绘空间的“某处”：从盲域到“空间的生产”

至此，问题再一次聚焦列斐伏尔的盲域概念。如果将都市革命视为一起事件，盲域便是其原因和结果之间的“暗箱”，也就是齐泽克所谓的“事件的空间”。就结果而言，盲域不仅催生了全新的第二自然（自然的符号），更是创造了起初被熟视无睹的整个都市领域。那么，所谓的盲域究竟是如何被发现的，其中又究竟发生了什么？

简单来说，盲域之所以存在，首先应当归因于启蒙理性以来形成的近代空间观念。它主要强调空间的中立性、纯粹性以及外在于人的本质，因而拒斥了人可以通过实践来干预、塑造和影响空间的可能性。这一空间观念先是由笛卡尔和康德在形而上学传统中确立了基本范畴，进而又随着近代物理学的发展在牛顿那里获得了几何抽象形态。由此，空间堕入了这样一种概念领域：它本质上意味着某种无限的、空白的“容器”和“载体”，并呈现为物理形态的抽象背景。这种空间尽管能够为人所认识，却并不受人的意志或精神的影响，因此是独立且外在于人而存在的。

伴随着空间观念的发展，在空间的物理现实、心理现实与社会现实之间逐渐产生了难以弥合的分歧。为了在这些领域间建构起理论的统一，从而修复物理空间、精神空间和社会空间之间的历史分裂，列斐伏尔以构建空间科学的名义提出了全新的“社会空间”理论。通过这一概念，列斐伏尔试图说明，空间并非纯粹、透明和清晰的事物，而是一种社会产物；空间表征出的无辜面孔掩盖了其内部的矛盾和冲突。这一现实状况是通过双重的幻觉被隐瞒起来的。列斐伏尔称之为“透明性幻觉”和“不透明性”或“实在性”幻觉。^②其中每一重幻觉都指涉并加强了另一重。

正是由于这一双重幻觉的存在，空间总是被人视为纯洁的，也就是非政治性的。通过破除这一幻觉，列斐伏尔证明了空间的非纯洁性：空间是政治的、意识形态的，它是一种完全充斥着意识形态的表现。^③空间并不是被某种政治意识形态扭曲了的认知对象，而是一直都是政治性和战略性的。社会空间总是受到各种社会因素和社会力量的影响。空间的变化也会反过来改变和重塑其中的内涵。列斐伏尔由此强调，空间从来都不是空洞的，它“总是包含着意义”。^④这意味着种种因素和力量的运动变化，尽管不易察觉，却往往都表征在空间的“某处”。

②④ 亨利·列斐伏尔：《空间的生产》，刘怀玉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22年，第43—45页，第226页。

③ 亨利·列斐伏尔：《空间与政治》第2版，李春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46页。

换言之，空间远不是什么僵化和一成不变的东西，它始终处于被塑造的状态，总是置身于变动不居的生产和再生产过程之中。空间中内含着社会关系的生产及某些关系的再生产，而且这种再生产是通过一种和现存社会紧密相关的方案来实现的。因此列斐伏尔指出，空间也是一种“方案”，空间的表征服务于某种战略，它既是抽象的，也是具体的，既是思想的、欲望的，也是被规划的。^①

在《空间的生产》这部总结性著作中，列斐伏尔对传统空间概念进行了总结和批判，并以新的“社会空间”概念取而代之。这实际上揭开了盲域的第一副面孔。而第二副面孔的揭露，则源自列斐伏尔对马克思主义“生产”概念的修正和发展，可看作对其早期盲域概念的进一步阐发。在他看来，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生产概念在范畴上过于松散，因而在实际分析中失去了明晰的定义和界限。生产要么在广义上指代作为社会存在的人类对其生活、意识、世界乃至历史的全部生产，要么从狭义上指代经济生产；在巨大的裂隙中，生产概念的价值及其辩证性实际上全都流失了。在列斐伏尔眼里，这表明生产概念仍然停留在抽象层面，从未真正到达具体。^②列斐伏尔相信，只有“空间的生产”才能够真正地实现马克思试图到达的“具体的抽象”。空间的生产正是要联结上述两个彼此割裂的范畴，以恢复生产概念的价值并寻回其辩证性。

为了实现这一理论目标，列斐伏尔指出，生产首先指“基于特定目的或目标”而“组织了系列行动”，并将一种特定的时间-空间秩序加诸其上。^③换言之，空间是作为社会生产的对象和结果而存在的；如果说人类社会实践就是在不断生产事物，那么空间显然是其产物之一。这并非简单地将社会空间化约为一个单纯的对象，而是认为它只是并列于其他的事物或产品而存在；空间不仅意味着被生产出来的事物，还包含着这些同存事物之间的关联。空间由此被看作是渗透和入侵了生产的概念，成为其内容中很可能最为本质的部分。^④它内含着一种关键的转向，即由空间中事物的生产转向空间自身的生产。^⑤

总的来说，在列斐伏尔那里，一种与空间有关的知识，作为一个整体直接介入了物质生产过程中——空间进入了生产力，而且自身“成了生产力”。在这一关键的变化中，现代经济的规划直接指向了空间的规划，即对于空间中某处的形塑，并几乎与之趋于等同。各种规模和体量的都市建设计划及相关的区域性管理，开始变得随处可见。这并非意味着社会空间单纯通过生产力构成，而是说社会空间是一系列中介在自身内部调停（mediate）造成的结果。由此，空间应当被视为内含于财产关系中并关联着生产力，特别是格外关乎土地的财产和形塑土地的生产力。

通过一系列的举例和论证，列斐伏尔进一步将社会空间的概念扩展开来。可以说，空间的生产是列斐伏尔空间思想的核心。它既是对现代世界纷繁复杂的问题进行分析的结果，也可以反过来作为分析那些问题的方法。这样一种空间认识来源于列斐伏尔对诸多空间现象的思考，特别是对城市急剧扩张、社会普遍都市化以及与其相关的各种空间组织问题的追问。

“某处”的征服与统治：抽象空间生产与资本积累乌托邦

空间总是在既定的生产方式和社会关系中呈现着自身独特的现实，这是由于特定社会的生产方式总是重塑着某处空间。基于此，列斐伏尔将当下的社会空间界定为“资本主义空间”，即由资本主义和新资本主义所生产的空间；它属于“抽象空间”的范畴。就前者而言，在资本主义社

① ② ③ ④ 亨利·列斐伏尔：《空间的生产》，第37页，第104页，第107页，第127页。

⑤ H. Lefebvre, "Space: Social Product and Use Value," in N. Brenner and S. Elden, eds., *State, Space, World: Selected Essays*,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09, pp.185-195.



会结构中,空间的主要功能在于作为一个整体来生产剩余价值——“利用空间如同利用机器一样”。在这个意义上,空间隶属于生产力和生产资料的范畴,一如商品的生产。就后者而论,这种抽象空间总是表现为均质化和非差异化的空间。在列斐伏尔看来,同质化的抽象空间,本质上就是能够在其中实现价值互换的商业化的空间。其核心和根本的使命在于“将空间进行分割,以便用来买卖”。

既然空间成为商品,就具有商品的根本属性,即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举例来说,作为一种空间形式的商品,房屋不仅可以用来住,也可以被交易。大卫·哈维由此提出,现代社会的房屋供给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发生了一种“怪异的转变”——从追求使用价值变为追求交换价值。在他看来,房屋的使用价值原本是以居住为主,现在却随着房地产经济的发展,日益变成投机的工具。^①在这个意义上,空间的使用价值,变成了其交换价值的“使用价值”。

上述转变一经完成,交换价值便开始如同引擎一般,在某处驱赶和鞭策着城市地理空间中几乎全部的使用价值:既包括特定建筑空间的规划和建造(即空间的使用),也包括居住和其他方式的使用(即可使用的空间),当然也包括将空间要素视为投机工具来使用。列斐伏尔认为,这一过程的正常化深刻源自社会分工的日趋细化和总体性的丧失。在他看来,总体性的消失意味着“每个人都在一个抽象的空间上进行操作,按照他自己的标准、他自己的比例”。^②因此,在城市化进程中透视一种空间的商品化,就意味着以总体性的视角考察复杂、含混和抽象的空间实践。这些实践所导致的重要后果,就是空间使用价值被交换价值全面压制甚至取代。

空间商品化的另一层,也是更重要的含义,是指空间乃是像商品一样被生产出来的。列斐伏尔指出,“在商品生产和空间的生产之间存在着一种辩证法”。^③只有通过商品化,城市空间才可能实现价值和剩余价值的生产,从而进一步实现资本的循环和积累。因此,在所有空间结构重组过程中,都贯穿着一条基本逻辑,也就是资本的逻辑:全方位和反复地生产城市剩余价值,从而持续榨取它。在哈维看来,城市化进程总是意味着“为实现生产、流通、交换和消费的物质基础而进行的创造”。换句话说,城市空间总是“作为一个复合的资源系统起作用,实现着价值和剩余价值的生产”。^④

这就是空间的资本化,而固定资本的投资则是其重要环节。根据马克思对剩余价值生产的分析,从劳动过程来看,资本包含两个基本组成部分,即生产资料(如原料、材料、劳动资料)和劳动力(人);而从价值增殖的角度来看,它们分别属于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⑤在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中,尽管剩余价值是通过劳动力在必要劳动时间之外生产出来的,但作为生产资料的不变资本自然也是其基础。并且,一旦作为不变资本的生产资料(也即生产的技术过程,还包括社会组织)发生革命,将会大大增加剩余价值的生产。^⑥

上面提到的“不变资本”更多指的是“封闭于生产过程内部”的固定资本,而完整的固定资本概念还包括另外一个内容,即“作为生产的物质框架”的固定资本。大卫·哈维称之为“生产的人造环境”。^⑦它包括码头、港口、工厂、仓库、商店、道路、运河等无数为人们熟知的生产要素。资本主义生产对固定资本的投资,由于其毋庸置疑的非空间流动性,不可避免地造就一个成规模的、完整的地理景观,服务于生产、流动、交换和消费。这个过程就是城市的城市化。

由此可见,当代社会空间正是一种资本主义积累乌托邦。在哈维看来,资本主义乌托邦过程的实现主要取决于两个关键要素,即国家权力形式的组织(特别是其暴力特征)与自由市场的内

① 大卫·哈维:《资本社会的17个矛盾》,许瑞宋译,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16年,第14页。

②③ 亨利·列斐伏尔:《空间与政治》第2版,第15页,第5页。

④⑦ 大卫·哈维:《资本的城市化:资本主义城市化的历史与理论研究》,董慧译,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13页,第6页。

⑤⑥ 《资本论》第1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43页,第583页。

在需求。一方面,作为过程的资本主义乌托邦理想总是需要“构筑某类它在其中发挥作用的空间”;另一方面,此种空间重组过程总是且只能植根于国家权力对各种制度安排和规则的主导。在这两个要素之间,某种“空间协商”(negotiation of spatiality)得以在具体地方发生,这就是资本主义乌托邦过程的空间化。

“某处”的陷落：矛盾性空间与积累乌托邦的破产

根据列斐伏尔的观点,当下的社会空间不仅包含着一整个“商品的世界”,还体现着资本主义的根本逻辑及其世界策略。抽象空间中的一切都仰赖货币和政治国家力量的组织和统治,并表现为多样化的固定资本形式。至此,一个由银行、商业中心、生产性实体(工厂等)、交通基础设施以及信息矩阵等构成的巨大网络逐渐形成。这个网络不仅基本清除了自然和历史的时空痕迹,还剥夺了包括感觉和经验在内的肉身的特质,并代之以一种由全新的自然性和历史性构造出来的整体。抽象空间已然成为主导和支配当代社会的主体。

然而列斐伏尔紧接着指出,资本主义抽象空间的统治理想并不能真正实现。这是由于抽象空间的统治有赖于具体的空间建成形式,而一旦具体化,抽象空间便转向了自身的对立面。因此,列斐伏尔认为,资本主义的抽象空间本质上是一种“矛盾空间”。

抽象空间一经实现,便会堕入某种矛盾性的局面。资本主义政治体制总是试图工具性地干预和利用空间,以期在总体层面介入经济领域。这有赖于某种宏观的同质化策略。通过这种策略,资本主义国家得以在充满差异的地方建立起丰富的联系网络,从而终结其孤立性和特殊性。然而,对空间差异的清除往往造成国家主导权力的过剩。由于企业乃至城市发展的特殊需求无法得到满足,国家权力的过剩普遍招致了地方空间的不满。毕竟,地方的发展有其关键前提,包括去中心化、弱化与国家权力的捆绑以及地方管理的高度自治等。^①一种中心性-边缘性的空间矛盾在此凸显出来,这一矛盾集中体现为(作为积累工具和价值载体的)边缘或地方空间对决策和权力中心的抵制。

只有经由某种同质化策略落实到具体的地方——也就是“某处”,资本主义抽象空间的支配才得以实现和发挥作用。然而矛盾的是,这种具体化一经实现便会转向自主化和差异化,也就是转向同质化和支配性的对立面。究其原因,抽象空间并不能生产出其“自身”——任何空间建成形式都是具体、真实和充满差异的,因此并不存在一种实存的“抽象空间”。这一内在于抽象空间的悖论,反而凸显了差异性空间的潜力和必要性。抽象空间的矛盾现实,无时无刻不在某处孕育着差异化空间的发生。

因此,列斐伏尔强调,抽象空间的矛盾并非是完全由空间自身决定。资本主义社会中典型的对立,如交换和使用、全球网络和地方性的生产消费等,本身就呈现为辩证的对立统一。正是这一过程的空间化,造成了抽象空间的矛盾。在这个意义上,空间应被理解为既是抽象的,又是具体的:空间中的各个组成部分都能够通过量化的方式进行(价值)交换,同时空间在社会层面上又总是真实的和本地化的。因此,抽象空间就是一个既表现为同质化,又包含着碎片化的矛盾性整体。

在上述认识的基础上,列斐伏尔对社会空间的未来进行了乐观的展望。他断言,未来的社会空间,必定是一种“差异性空间”(differential space),即充满差异的社会空间。它以取用性而不

^① 亨利·列斐伏尔:《空间的生产》,第557—558页。



是支配性作为主导原则，由使用价值而不是交换价值作为决定因素。总的来说，这种全新的空间在各个层面体现了对资本主义抽象空间的拒斥。然而，列斐伏尔并未给“差异性空间”以确切的界定。相较于系统化的社会空间重组实践，以愉悦性和取用性为核心的差异性空间概念，更像是某种乐观的期待或浪漫的想象。

事实上，列斐伏尔从未试图在政治经济系统的层面设想全新的空间重组实践，而是坚持将行动领域限定在身体、艺术以及日常生活的范畴中。正如哈维所言，列斐伏尔对所有传统的空间乌托邦形式都报以一种根本的否定态度。^①这种态度主要出于对乌托邦辩证特质的警惕——一经空间化，乌托邦便总是呈现其封闭性。可以说，另一种社会空间乌托邦重组的可能性，在此遭到了列斐伏尔的彻底消解。

① 大卫·哈维：
《希望的空间》，胡
大平译，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
社，2006年，第
177—178页。

“空间强迫症”：资本主义积累的空间症候及其启示

总之，就一种空间病理学的视角而言，都市批判理论最重要的启示之一，便是揭示出内在于现代空间生产乃至整个资本主义地理景观变迁的、显著的强迫性重复色彩：不断尝试掌握和统治空间中的某处，但同时又不断陷落、坍塌和耽溺于某处。在列斐伏尔那里，前者被表述为抽象空间的生产，而后者则是具体的地方或“矛盾性空间”否定抽象空间的表现。在哈维那里，前者表现为资本追求循环因而不断创造“积累乌托邦”（也就是“固定资本”）的空间实践，后者则预示着积累乌托邦陷入固定、僵死从而遭到废弃的“反乌托邦时刻”。

不妨尝试借用精神分析理论中的强迫性重复，来理解上述资本主义空间实践充满矛盾和悖论的过程。简单来说，在弗洛伊德那里，强迫性重复这个概念本意味着某种无法摆脱的、总是被驱动地进行的个体行为模式。它往往表现为某种不断操演的重复过程，如幼儿为了克服与母亲的分离焦虑而进行的“巡回(fort-da)游戏”，或是洁癖症患者偏执的重复清洁活动。而这种重复的目的，一方面在于想象性地解决现实焦虑和创伤，另一方面则在于强制性地沉溺在象征性地解决问题的快感之中。

上述弗洛伊德所谓的“疾病获益”现象，显然同样存在于资本主义的系统性运作中。列斐伏尔发现，资本主义能够在今天得以续存（或“幸存”），实际上靠的正是空间的生产。在他看来，资本主义即便无法解决（而只是缓解）其内在矛盾，同样也能够成功地实现增长，而手段正是“占据空间，生产空间”。^②如果说精神病理学意义上的强迫性重复，终极目标是透过贯彻“死亡本能”来超越快乐原则，回归某种静止和无冲突的恒定状态，从而获取主体自我的掌控，那么空间病理学意义上的强迫性重复，同样意味着资本主义积累危机下的空间修复策略——事实上，每当面临生产过剩或利润率下降，资本主义都会通过空间扩张（城市化与全球化）或重组（基建投资与城市更新）来吸收过剩资本，延缓危机爆发。

② 亨利·列斐伏尔：
《资本主义的
幸存：生产关系的
再生产》，米兰译，
上海：上海社会
科学院出版社，
2024年，第23页。

这种矛盾性从根本上揭示了资本主义都市社会“空间强迫症”的病理现象。列斐伏尔强调，空间的生产是资本主义得以续存的关键之一：资本主义的空间生产与剩余价值的生产、资本主义危机的化解和矛盾的转移总是紧密相连的。哈维也曾指出，资本流通总是依赖一定的建成形式或固定的资本景观，因而总是离不开某种迫切而又充满悖论的“创造性破坏”进程：有计划地废弃旧的地理景观，并在其基础上建造新的景观。

因此，这里的空间症候，并非指那些可以通过社会分工及实践理性针对性地予以解决的具

体“城市病”(如交通堵塞、环境污染等),而更接近弗洛伊德在探讨神经症时所谓的“症状”(symptom),即一种“冲突的结果及其状态”。在其中,多种相互抵牾的社会因素与力量在空间生产造成的症状中相遇,又经由该症状进行妥协与相互调和,从而形成了新的、相对稳定的社会空间景观。在这个意义上,社会空间本就无法避免成为某种多异性的矛盾综合体。或许,这正是列斐伏尔拒绝在可操作的层面即政治经济层面上设想社会空间重组策略的关键原因。

然而,列斐伏尔的暧昧态度,并非都市批判理论视角下社会空间未来的唯一出路,并不意味着除了展望一种“差异性空间”,以身体行动创造全新的日常生活“情境”和“节奏”之外,我们针对“空间强迫症”别无他法。例如,哈维就坚持,必须在包括管理章程、系统组织和权利体系等制度领域,展开持续和广泛的改革斗争,因为制度的斗争有助于提高物质福利和确保民主形式,同时也有助于在由资本积累逻辑和市场力量主导的消费社会之外,开创全新的集体和文化形式。

应当承认,自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施以来,中国城市飞速发展的历史,因其社会资本积累和财富创造这一核心使命,同样带有显著的抽象空间生产-重塑色彩,因而同样会受困于“空间强迫症”的症候。政治经济层面会有城乡差距、环境污染、区域性的不平衡发展,文化层面亦有被诟病的“千城一面”,如同质化的都市肌理与复制照搬的网红街区等,都是充分的例证。然而,随着我国房地产市场回归理性,“大力实施城市更新”作为国家中长期发展规划,经由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在2025年末被写进了“十五五”规划建议中,^①围绕老旧生活社区、工业遗产和历史街区活化改造的新型城市更新,也在发展战略层面得到显著提升。这无疑表明,未来的城市更新将不再唯金融化、唯市场化,而是致力于统一经济、社会和生态效益与文化遗产等考量因素,整体提升未来城市的面貌和生活方式。

正如大卫·哈维的期许,社会空间的希望将被寄托于某种特殊的“建筑师”身上——不仅就职业建筑领域而言,更是就社会科学和文化研究所触及的制度、观念领域而言。更重要的是,只有这些“建筑师”能够“从事日常实践并以此有效地保存、构造和重建我们的生活世界”,因而可以肩负起“为新的可能性、未来的社会生活形式打开空间”的任务。^②就像曾经大规模工业化生产和都市现代化进程造就了现代主义建筑及其全新的乌托邦栖居理想,今天的全新社会发展诉求,显然同样在呼唤能够面向社会未来的新型建筑师。同样在2025年年末,世界建筑界最高荣誉“普利兹克建筑奖”(The Pritzker Architecture Prize)被颁发给了来自中国的建筑师刘家琨。^③而根据主办方和评委的一致意见,其获奖原因正是在具体的建筑实践中平衡了历史与现代、集体主义与个体价值、乌托邦与日常生活。换言之,无论是建筑还是城市尺度上的空间实践,最终的目标都不仅限于创造某种理性的机器,而更在于通过对它的“取用”来创造更好的生活。或许,“大力实施城市更新”被写进“十五五”规划建议,和刘家琨获得建筑界最高荣誉,二者的相继发生绝非什么巧合,而正是全球反思资本主义社会“空间强迫症”、共同走向社会空间未来的明证。

编辑 张蕾

①《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2025年10月28日, https://www.gov.cn/zhengce/202510/content_7046050.htm。

② 大卫·哈维:《希望的空间》,第196页。

③ Reyyan Dogan:《2025年普利兹克建筑奖颁奖典礼视频发布,致敬刘家琨》,韩爽译,2025年11月17日, <https://www.archdaily.cn/cn/1036038/2025-nian-pu-li-zi-ke-jian-zhu-jiang-ban-jiang-dian-li-shi-pin-fa-bu-zhi-jing-liu-jia-kun>。